

评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 ——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李嘉谷

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一书(王桧林主编《抗日战争史》丛书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为止的中苏关系史专著,全书共6章30万言。该书文笔流畅,夹叙夹议,有分析,有评论,是一部有新意的学术著作。

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50年代中苏两国都十分重视中苏关系史的撰写。当时中国有影响的著作是彭明撰写的《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苏联则有贾丕才撰写的《1931—1945年的苏中关系》(1956年莫斯科出版,赵承先、忻鼎明译,1957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论述中国抗战时期苏中关系的专著。贾丕才后又在此书基础上扩写成一本完整的苏中关系史。但在50年代,许多档案资料尚未公开,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档案均被带至台湾,因此,无论彭明,还是贾丕才的著作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应该说还是粗线条的。同时,由于中苏两国当时有亲密的结盟关系,中苏双方学者在撰写中苏关系史时,均存在一些片面性,贾丕才的著作尤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论述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2月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与同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书中根本不提它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作为历史著作,未免缺乏科学性。

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成了“禁区”;在苏联则继续进行,仅中国抗战时期苏中关系史的

专著就出版了两部：B·A·博罗金：《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1941年）》（1965年莫斯科出版）；A·M·杜宾斯基：《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1980年莫斯科出版）。这些著述，史料较前丰富，但基本观点未变。

80年代，在中国大陆，中苏关系史又重为人们所关注，学者们注意有关历史资料的发掘，对中苏关系史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考察中苏两国关系的历史，苏日中立条约、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时更成了讨论的热点。

王著注意吸收80年代以来有关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如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缔约谈判，对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分析与评价；对美国学者约翰·加弗的近著：《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1988年纽约——牛津出版）也给予了应有的注意。王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内容涉及中苏复交、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缔约谈判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抗战前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中苏关系的冷漠与恶化、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中苏缔约谈判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专章论述了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写出了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动荡的特点。作者以个人的力量，潜心钻研，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了这样一部难度较大的著作是不容易的。该书对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叙述比较清晰，对一些重大事件介绍得比较全面，引证了不少资料，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史学界过去或肯定该条约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或强调它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错误。作者分析说，该条约的签订使日军增加了对华压力，但鉴于当时苏联的国际处境，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是必要的，它使苏联在不久来临的苏德战争中能集中力量对付世界头号法西斯——德国，因而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是有利的，而条约所附

声明书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又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对中苏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这是一家之言。该书对苏联在中国抗战时期物资上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的分析与对苏联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的批评(第203—209页),是有道理的。但需看到在当时情况下,苏联以军火物资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未必行得通。1937年12月苏联政府曾通过中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向蒋介石正式表示拟赠给八路军武器,但未得蒋介石同意,故作罢。^①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火援助也已停止,此时对中国共产党援助就更少可能了。^②

自然,王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史料的运用不够严谨。如该书说:“1941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外长郭泰祺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晤,提议就中苏军事合作进行谈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见第156页)这一说法的来源书中注明是苏联学者杜宾斯基的著作《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年)》一书第163页。但查该书并无这样的记载。据我所知,这一说法可能出自贾丕才《苏中关系史》(1958年莫斯科出版)一书第305页。贾丕才亦未注明资料来源,贾著原文试译如下:“外交部长郭泰祺7月15日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晤时建议中苏商讨军事合作问题,以防日本进攻苏联。此后,1941年7月至11月,郭泰祺又多次重提这一问题。”在苏联看来,此提议的目的在挑起苏日战争,因此苏联婉言拒绝。这里,中国外交部长并未直接要求苏联参加对日战争。

① 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1981年台北出版,第505—506页。

② 王著第206页引述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延安日记》,(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6年版,中译本),第35页上的一段话说:1942年5月22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佛拉第米洛夫谈话时曾提出这种要求:“告诉斯大林:我们需要武器!我们要用来打日本人!”据查,此话是在该书第7页上,并无“我们要用来打日本人!”的字样。

我认为,这同王著转述的意思是有差异的,就是说,这同蒋介石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前向苏联提出的参战要求是不一样的。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不愿参加对日作战,而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如日本不主动进攻,苏联显然更不愿意参加对日作战。

这里顺便说一点个人的意见。王著将中国一再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而苏联不愿出兵对日作战这种分歧,说成是促使中苏关系冷漠的来临(见第143页)和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见第248页),我认为这尚有可商榷之处。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派杨杰赴莫斯科,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促进苏联参战”,此后中国一再向苏联提出参战的要求,但均为苏方婉拒。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由于苏联对华物力、人员的援助,中苏关系显然是趋于密切的,并不因为苏联没有出兵对日作战而影响两国关系。因此,两国关系疏远的原因,并非在于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而是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断绝等原因。蒋介石从欧战一爆发,就主张“先亚后欧”,但美国却一直将战争的重点放在欧洲。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大力援助苏联的抗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又提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但美国仍将战争重点放在欧洲,即“先欧后亚”,苏联自然也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的“先亚后欧”主张亦无结果。^①

另外,该书说:崔可夫等苏联军事顾问帮助制定了1940年5、6月展开的宜昌战役计划(见第115页)。其实崔可夫等人帮助拟定的是1941年9月开展的中国军队反攻宜昌的作战计划。1940年5—6月宜昌战役时,崔可夫尚未来华,作者将这两次不同的作战混淆了。

^① 参见王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该书尚有一些译文上的讹误,如苏联第三次对华信用借款的第一个供货合同内有炸弹 15370 颗,该书误作汽车 15370 辆(见第 100 页)。又如该书第 166 页引述加弗著《中苏关系(1937—1945 年)》一书第 116 页上的一段话说:如加弗所指出,虽然有苏联继续援华的承诺,但“苏日中立条约却象征蒋介石对苏联外交的最终崩溃”,因而继续希望苏联援助是“无用的。”从原文看,加弗的著作此处说的是苏联参战,并未说苏联军火物资援助。^①事实上,据中方档案记载,苏联援华的第 8 批军火物资约 5000 万美元的动用日期是 1941 年 6 月 1 日,第 9 批数量较小,动用日期或在此稍后。或许可以设想,如果苏联西线的形势较为稳定,苏联并非不可能继续给予中国军火物资的援助,因为在日本否认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这并不违背苏日中立条约,而这样做对苏联的安全却是有利的。自然,这近于是对历史的假设了。

细心的研究者也许还能指出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我认为,评价历史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要求它完美无缺,要看它比前人对历史的叙述更准确,更是否有所前进我认为,总的说王真的著作是值得肯定的。他年轻,文思敏捷,又很勤奋,如果今后在史料的运用上更准确,那定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最后,希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后更重视这套丛书的校对工作,以尽量减少印刷的错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It was now clear that the hope which had buoyed Chinese resistance since 1937,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enter the war against Japan, was futile.

译文:很显然,那种期盼苏联参战抗日的希望是徒劳的,而这种希望自 1937 年以来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抗战。